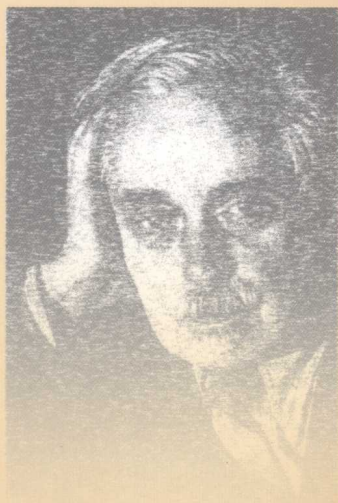




普罗普

民俗学思想研究

puluopu minsuxue sixiang yanjiu

赵晓彬 ◆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哈尔滨师范大学杰出青年基金项目
哈尔滨师范大学学术著作基金项目

普罗普 民俗学思想研究

赵晓彬 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研究/赵晓彬著.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3
ISBN 978-7-207-07308-2

I. 普... II. 赵... III. 民俗学—研究 IV. K89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7733 号

责任编辑: 张晔明 姜海霞

封面设计: 张 涛

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研究

Puluopu Minsuxue Sixiang Yanjiu

赵晓彬 著

出 版 者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宜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E-mail [hljrmchs@ yeah. net](mailto:hljrmch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省地质测绘印制中心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625

字 数 200 000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7-07308-2/G · 1724

定价: 26. 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先读者言

19 世纪末—20 世纪前半期,欧美语文学界结构主义盛行,提倡严密的科学方法论。俄国也兴起形式研究的流派。1914 年出现以雅可布逊为代表的莫斯科语言学派和以什克洛夫斯基为代表的彼得堡诗歌语言理论研究会。这批学者颇受索胥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如果注意到美国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于 1933 年,哥本哈根学派代表学者叶尔姆斯列夫的《语言学绪论》出版于 1943 年,而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在 1928 年问世,就不难相信普罗普是此中先行者之一。他可说是洛特曼的前辈。

索胥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特别强调符号学研究中的共时和历时两个方面。共时研究必须着眼于系统性。在符号系统中每个单位符号的价 (value) 完全取决于它在整个系统中的位置,也即是它与本系统的所有其他符号之间的关系。符号系统中基本符号的数目是有限的。它们经互相组合排列,却能衍生出无数复杂符号。复杂符号的价是由作为组合成分的基本符号的价和它们之间联接号的意义相合而生成的。这就是逻辑学家弗莱格提出的“组合原则”(compositionality)。

普罗普把这些理论应用于民间文学研究。在《故事形态

学》中把每一则民间故事看作一个复杂符号,经过分析、比较、归纳,得出七种角色及其典型行动,以及三十一个结构类型(他称之为“功能”)。最后普罗普以神怪故事为例得出结论:“多数神怪故事具有完全一致的结构。”

结构主义学派并没有否认历时研究,但实际上他们都强调共时研究。就我所知,他们没有提出历时研究的系统框架。普罗普的《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是历时研究的出色成果。中国传统的索隐派的考据学者着眼于个别作品内容与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影射关系”,普罗普着眼于故事内容的类型意义(近似叶尔姆斯列夫的 content-form)与社会发展阶段(尤其偏重初民社会)的民族学-民俗学事实相比较,作出自己的解释。

我受赵晓彬博士的启发,重温普罗普学说,以为对故事的历时系统的研究不能停留在个别角色、行动甚至情节上,而要研究整个系统是如何“与时俱进”的。好似树木,树干长大了,木颈部的年轮逐年增加,必须改变横剖面的整个纹理图案。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更是如此。因此我想,例如拿中国六朝时代的故事与唐朝故事的 content-form 和结构作比较研究,或许能揭示出我国故事系统的一段历史轨迹。

从另一方面,用普罗普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同一时代不同群体(如少数民族、侨民与土著居民等)的文学作品,也是待人开发的“富矿”。

1999年我读赵晓彬博士的《俄国文学中的诗化散文问题》。那里她用洛特曼等人的理论来挖掘俄罗斯散文作品里的诗意内涵。我很欣赏她的鉴赏能力和分析方法。

八年后的今天她送来新著手稿。拜读之余,十分欣喜,佩服

她用功之勤和蕴积之厚。本书介绍和研究了普罗普的几部代表作,使读者能窥见普氏学说全貌,其学术价值自不待言。作者要我写几句读后心得,我就抛块砖头,向作者和读者请益。

李锡胤于黑龙江大学

2007年1月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普罗普的学术活动评述	(12)
第二章 普罗普与《故事形态学》	(41)
第三章 普罗普与《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	(86)
第四章 普罗普与《俄罗斯故事论》	(117)
第五章 普罗普关于滑稽与笑	(168)
结 语	(210)
附译文 1 俄罗斯民间创作的体裁划分原则	(216)
译文 2 “马把苏辰科带到另一个王国”	(220)
参考文献	(230)

绪 论

普罗普(1895—1970)是俄罗斯著名的民俗学家、文艺理论家,举世公认的民间文学、文艺学研究的一代宗师。他所研究的内容广泛涉及民间故事、史诗、民歌、礼俗、文艺理论和美学等诸多方面,并始终具有明确的理论探索的特点。他研究民间故事的方法极具开创性,在国际上被视为民间创作结构分析的卓有成效的先行者。他从诸多民俗文化现象入手,归纳出它们共同的叙事结构模式,并对它们进行共时性和历时性分析,找出其中的叙事规律、结构框架及其发展历史和变化原因。他的研究方法对法国的结构主义、叙事学以及人类学都产生过重大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普罗普的研究重在寻找各种民间文化形态的构建及表达的规律性,同时还贵在探寻这些民间文化形态表达规律的历史根源,所以,俄罗斯学术界又将普罗普的研究称为俄罗斯的民族诗学研究。此外,普罗普还涉猎到一些更广泛的文艺理论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普罗普在当时已成为世界上最受瞩目、最有魅力的学者之一。

普罗普一生治学勤勉而严谨,共撰写了6部专著:生前出版的专著有《故事形态学》(1928年第一版,1969年第二版),《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1946年),《俄罗斯英雄史诗》(1955年第

一版,1958年第二版),《俄罗斯的农事节日》(1963年);去世后出版的专著有《滑稽与笑的问题》(1976),《俄罗斯故事论》(1984)。此外,他在不同时期里还撰写了许多文章,后来学术界将这些文章收集并出版过不同版本的文集,如《民间创作与现实》(1976),《民间创作诗学》(1998),《故事·史诗·歌曲》(2001),《民间创作·文学·历史》(2002)等。可以说,普罗普的著述颇丰,并且前后自成体系,在60年代的西方学术界引起了高度的重视。近些年来,普罗普的名字更是名噪国内外。他的著作已被译成世界多种文字,已为每一位民间文学家、文艺学家、语言学家和民族志学家所熟知,正如俄罗斯研究普罗普的学者K. B. 契斯托夫所说的那样,“很少有不提及他的名字和不引证他的论著的民俗学书籍”(Проп,1984:3)。

国际学术界开始掀起对普罗普的研究热潮还是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而在他的本土俄罗斯则始于70—80年代,到了90年代这一热潮达到了鼎盛。1995年在苏联国内发表了一些有关普罗普生平纪事的材料,如《普罗普的晚年日记》,普罗普的生平,以及他的学生及同仁对他的回忆录等,这些材料对当今研究普罗普学术思想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1995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召开了纪念普罗普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递交了数量众多的关于普罗普学术思想的论文,这一切足以说明普罗普的学术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已得到更深入、更广泛的认可。这位学者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享有极高的声望,而他的著作则给予了世界语文科学巨大的影响,他的学术思想早已为世界民间文学、文艺学和结构主义文艺理论研究史翻开了极其重要的一页。

然而,正是关于这样一位在国际学术界上有着如此非同凡响的文艺理论家、民俗学家,目前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尚仅限于译介或对其学术地位的描述,对其学术思想的探讨则大多限于对其故事形态学的思考,尚没有展开对这位世界知名学者的专门系统的研究。普罗普的名字在我国只是在80年代才为我国文艺学界和民俗学界所知晓。仔细查阅我国目前对普罗普著作的译介以及涉及普罗普的论文,我们发现,这些工作与普罗普的丰富的学术思想实在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远远赶不上普罗普在国际上的知名度。正如我国学者,普罗普的研究专家贾放在几年前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当时(指80年代——笔者注)是中国俄苏文学译介与研究的繁荣时期,拥有三本专业杂志和一支人数众多、兵强马壮的翻译、研究队伍,但这样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俄罗斯著名学者,却基本上一直靠英译的‘转口’或靠对‘转口’的转述而进入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贾放,2000)而且,从这些译介和论著内容来看,大都是从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这些国际性理论思潮的角度出发,将普罗普定位于这些流派的代表,对他的研究仅限于早年出版的处女作《故事形态学》的内容及其研究故事的形态学方法。几年过去了,如今学术界在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相关于普罗普的研究之作。

纵观我国以往对普罗普的研究现状,依据不完全统计,我们发现,最早对普罗普的学术著作进行翻译的有:王智量译的《英雄叙事诗研究中的一些方法论问题》(载《民间文学》,1956年),蔡鸿滨译的《神怪故事的转化》(载《俄苏形式主义论文选》,中国社科,1989年),杜书瀛等译的《滑稽与笑的问题》(辽宁教育,1998年);此外,由刘魁立和贾放翻译的《故事形态学》

和《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两部译著尚未出版；涉及普罗普的论文有：《结构主义理论述评》（载《世界文学》，1979年），《关于结构主义文艺批评》（载《外国文学研究》，1981年），胡亚敏的《结构主义叙事学探讨》（载《外国文学研究》，1987年）；译著或论著中涉及到普罗普的章节有：《结构主义与文学》（春风，1988年）；《二十世纪文学理论》（北京三联，1988年）；《结构主义和符号学》（上海译文，1987年）；《结构主义神话学》（陕西师大，1988年）；《故事学纲要》（华中师大，1988年）；《当代叙事学》（北京大学，1991年）；《叙事学导论》（云南人民，1994年）；《结构主义语义学》（北京三联，1999年）；《中国民间故事形态研究》（汕头大学，1996年）；《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三联书店，2000年）；《叙述文革》（读书，1999年）等。

单从以上诸研究成果的标题上就可以看出，这些研究尚不是对普罗普学术思想的专题研究，只是在研究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文论、叙事学和符号学等过程中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普罗普的故事学的主要思想及其方法论，有的作者率先介绍了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其结构叙事学思想，阐述了普罗普“功能论”、“人物结构地位的类型化”与“情节”的关系，以及普罗普理论在结构主义叙事学中的奠基作用、与法国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的关系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在几年前贾放博士专门研究过普罗普的故事学思想，发表过的几篇有关普罗普的论文，对普罗普的学术思想主要是故事学思想进行了富有见解的研究。在纪念普罗普逝世30周年之际，贾放还撰写了《普罗普：传说与真实》一文，对

普罗普的生平与创作进行了客观的评述并对俄罗斯乃至世界学术界围绕普罗普的不同评价做了全面的介绍(贾放,《俄罗斯文艺》,2000年);贾放在她的另一篇文章《普罗普“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与故事的历史比较研究》中则指出,普罗普作为结构主义的先驱,一方面运用了结构类型方法分析俄罗斯的神奇故事,归纳出故事有三十一种功能,为许多民间文学研究者用来分析本国的故事或神话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他还明确提出了形态研究应该与历史研究联系起来,并在对故事做出描述之后又对故事的产生根源做了大量的详细的追溯(贾放,《民间文化》,2000年);《普罗普故事学思想与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一文则探讨了普罗普的故事学思想对俄罗斯维谢洛夫斯基历史诗学某些重要思想的继承,她认为,二者的学术渊源关系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梳理总结:一是维谢洛夫斯基的“情节诗学”与普罗普的故事结构功能研究,二是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起源学研究与普罗普的“民族志主义”,三是方法论的研究,“归纳诗学”与历史主义(贾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在《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双重风貌”》一文中还总结了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研究的两个理论视角:故事讲述人研究理论和故事文本结构形态研究理论,认为二者是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民间故事的本质和独特性。这两派理论兴盛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了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双重风貌”(贾放,《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而贾放后来还翻译了《神奇故事的结构与历史研究》(《民俗研究》,2002年)一文,这是普罗普为反驳列维-斯特劳斯而撰写的文章。该译文的发表对我国进一步了解普罗普故事学的“真貌”,以及他与列维-斯特劳斯之间关系的渊源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又有学者发表文章,研究普罗普的故事学思想及其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分野。周福岩的《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周口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一文从方法论角度再次对普罗普与列维-斯特劳斯的学术思想做了比较研究,文章指出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强调系统描写相对于发生学研究的优先性,而列维-斯特劳斯则指出普罗普故事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周福岩指出,就口承文化传统研究而言,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斯特劳斯的批评在对民间叙事作品的描述与分类及文本与语境的关系等问题上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普罗普试图捕捉内在于民间故事的自足原则,而斯特劳斯则试图发现隐匿于作品(如神话)背后的观念形态;周福岩在另一篇文章《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论》中还谈到了学科史上对民间故事研究在方法上经历过几次重大范式的更迭,它们都不自觉地触及了文学批评和传承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历史-地理学派重视文本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是第一个主张对故事全面考察并加以分类的学派;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并未从根本上超越以往的分类法,只是要求分类更加精细有效;列维-斯特劳斯认为普罗普的研究是形式主义的,并从结构人类学立场出发展开对形式主义的批评(《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此外,还有许多学者在分析或研究民间故事问题时都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普罗普的故事学方法和思想理论,如吴文艳的《童话里的原始思维质态》(《上海师大学报》,2001年);梁永佳的《俄狄浦斯型故事在西方的研究》(《民间文学论坛》,1996年);陈玉平的《“灰姑娘”角色的成年礼内涵》(《民族文学研

究》,1991年);还有学者翻译了戴维·佩斯(美国)的《超越形态学:列维-斯特劳斯与民间故事分析》(《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2001年)等等。在以上学者的研究中,有的依旧肯定了普罗普的结构主义故事学方法的进步意义,并运用这一方法分析我国的民间故事,有的继续批评了这一方法中的形式主义因素,并与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的民间故事学方法做了比较。这些批评可能是直接来源于或者说是受到法国的结构主义大师列维-斯特劳斯本人对普罗普的批评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有详细的评述);刘守华的《神奇母题的历史根源》(《西北民族研究》,2002年)一文则运用了普罗普的《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的理论资源,较为详细地分析了中国神奇幻想故事的母题的历史根源;此外,近年来还有一篇文章,即穆馨的《普罗普民间创作问题研究》(《俄罗斯文艺》,2003年)一文也值得注意,该文对普罗普的英雄史诗研究,民间创作的天然属性、题材及其历史类型(如壮士歌等),民间创作的历史主义等许多问题的研究都做了重要的探讨,这是我国学界对普罗普的后期学术成果所做的进一步研究,但该文仅限于对普罗普后期学术思想的总结与宏观评述,尚未展开对普罗普后期学术成果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总之,纵观我国普罗普学术思想的研究史可以发现,20世纪80年代前后我国对普罗普的研究仅局限于其早期的《故事形态学》,一些学者的研究也只是借助二手甚至三手的来自研究俄国形式主义和法国结构主义文论等材料完成的。到了90年代,对普罗普的研究进入了深入探讨阶段,开始触及普罗普学术中的一些细节问题,同时涉及到普罗普的后期学术思想研究;

进入 20 世纪之后,学界更多关注的是普罗普的完整的理论思想的构架,除了对其故事形态学、故事的历史根源作进一步的探究外,学者开始研究其英雄史诗、壮士歌等民间题材的自然属性。可以说,经历了数十年的挖掘、深入探索,目前我国学界对普罗普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可喜的成果。然而,很明显,几十年来我国学界对普罗普的研究主要限于学术译介、论文,而在这些著述中宏观评述多于微观研究。目前除了以上仅有的两个已出版的译本和涉及普罗普故事学思想的个别译文外,还没有普罗普的其他著作的译本,更没有比较系统的评述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的专著。

本书主要是对普罗普的一些重要学术著作所做的思考。诚然,我们在思考过程中也没有离开对普罗普的生平与学术介绍,但已侧重了对其学术活动的全面评述,涉及到对普罗普各个时期的学术著述的阐释。我们以为,这只是探讨普罗普学术思想的第一阶段,还算不上深入的学术研究,就算作是通向深入研究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的殿堂所迈出的第一步。不过,我们研究普罗普还是要力争对普罗普的民俗学思想进行实质性的探索,这对补充我国在此方面学术研究的不足应该是有意义的。研究普罗普的目的,就是要从整体上思考普罗普在俄罗斯乃至世界民俗科学领域里的贡献:如认识《故事形态学》中所描述的研究故事的结构方法,弄清《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中研究故事的根源和历史的态势,揭示普罗普在《俄罗斯英雄史诗》中研究民间史诗的结构和诗学特征,阐释普罗普在《俄罗斯的农事节日》里对俄罗斯农历节日的来源及节庆仪式的习俗的研究,确定普罗普《俄罗斯故事论》关于各种民间故事体裁特征及类型,全面了解

普罗普的文艺观,特别是他关于“不笑公主”故事的礼仪内涵和关于果戈理创作的滑稽与笑的本质的阐释。相信这些思考将对我国学术界进一步深入研究普罗普的民俗学乃至普遍的文艺学思想都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研究普罗普的民俗学思想对于探讨我国民间文学的创作本质与规律,推动我国民间文学学科理论的建设也会添砖加瓦。

我们研究普罗普的思路是:第一,研究普罗普的民间文艺学思想定位。普罗普的六部论著和四部论文集分别涉及到俄罗斯民间故事、英雄史诗、民间节日、民间礼仪等诸多方面。可以说,他的研究是俄罗斯民间文化形态的全方位的研究,而不单纯是民间故事研究;第二,普罗普的学说是一个体系。普罗普认为民间故事、史诗、礼俗等是一套民间叙事系统,它们之间是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的,它们有着共同的叙事结构。普罗普是把民间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形态来看待的,所以,他的六部作品是一个研究系统,而不是相互孤立的。我们的这种看法与法国结构主义者不同,后者多注重普罗普的叙事形态研究,而忽视了其他,我们认为这是割裂了普罗普;第三,普罗普的学说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新的思想。以往人们认为普罗普提供的只是一种深层结构的研究方法。我们认为仅把普罗普的研究看成一种方法是不够的,普罗普提供的实际上是一种新思想,他把历时性研究与共时性研究相结合,对事物进行整体把握,这种思想在作者所处的时代是先进的,在现代仍有借鉴意义;第四,我们在研究普罗普时绝不是对普罗普进行考古式的挖掘,而是考虑他的思想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我们研究的主要内容是:在绪论中提出普罗普在国际学术

界的地位及研究普罗普学术思想的必要性,回顾我国学术界对普罗普民俗学思想的研究现状;在第一章里介绍普罗普的生平与学术活动,探讨普罗普思想体系形成的学术背景和时代根基,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围绕普罗普所发生的几个传说;第二章介绍和思考普罗普研究故事的形态学思想,专门全面地转述普罗普在《故事形态学》中提出的神怪故事的三十一一种功能,重点向读者介绍普罗普的共时描写神怪故事的方法;第三章则主要是介绍和探讨普罗普研究神怪故事的历史根源的思想:如普罗普对故事与古老文化习俗、礼仪、神话、原始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对神怪故事的远古基础的追根溯源,对故事的母题与礼仪类型的研究,对故事与神话的关系的阐释等等。该章主要探讨普罗普的历史主义研究民间故事的思想;第四章探讨的是普罗普的俄罗斯故事论,如普罗普对俄罗斯故事的收集史及其研究史的回顾,继续深入探讨普罗普在前两部著作里已开始研究的神怪故事以及在《俄罗斯故事论》中又新增的、积小成大故事和日常故事这三种故事体裁的情节结构、产生及历史发展;第五章则是对普罗普的滑稽与笑的理论问题的专门探讨。该章不仅首次提出普罗普研究民间创作中笑的礼仪内涵,而且还涉及到普罗普更广泛的文艺学思想——滑稽理论思想研究;在本书后面还附有普罗普的“俄罗斯民间创作的体裁划分原则”一文,以及俄罗斯学者乌斯宾斯基在纪念普罗普诞辰 110 周年之际撰写的文章的译文。

我们将采取的研究方法:一是传记研究与理论思考相结合,如普罗普生平介绍与学术综述相结合;二是横向研究与纵向研究相结合,书中涉及普罗普与维谢洛夫斯基的比较,以及普罗普